

洛译昭晖

回顾与瞻望

一个县委书记转折时期的陈述

邓正高 著

洛 泽 昭 晖

准印证号：昭新出（2008）准印字第 26 号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：7

册 数：1~1000 册

印 刷：昭通新侨彩印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昭通市昭阳区侨通路 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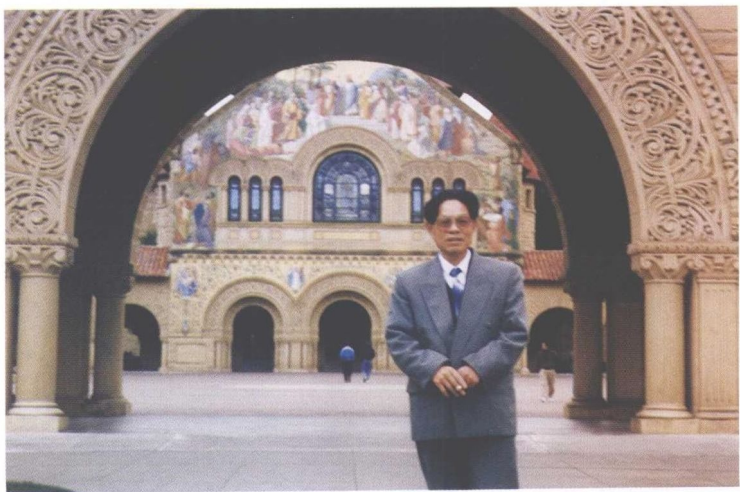
电 话：0870-2233881 2233222

若装订有误，请与厂家联系

2008 年 7 月印刷



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于彝良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



在美国斯坦福大学



在美国尼克松故居



作者近照

二〇〇八年二月

序

洛泽河发源于贵州威宁草海，从著名的乌蒙山东面蜿蜒曲折地奔流到彝良县境，从南而东流经大关、盐津汇入滔滔长江。

彝良县洛泽河养育了著名将军罗炳辉和雷锋式英雄孔繁松，20世纪末中国经历了一场名叫“文革”的浩劫，当时的作者在昭通挨斗挨打，被“解放”后，受命彝良县委副书记，又遭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摧残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受命彝良县任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，主持该县全面工作。按照党的新时期的方针政策，在中共中央、省、地委的领导下，进行了拨乱反正，平反纠正解放以来尤其是十年浩劫制造的8053人(件)冤、假、错案；叙述了“文革”在一个县和昭通地区的始末，也是全国“文革”的缩影。主持和经历了该县农村改革，包产到户，奠定了新时期建设冲刺的准备。本书谱写了这个人杰地灵的彝

良——洛泽昭晖新篇章。

历史往往不是以喜剧告终，他却在一件县法院处理的平凡婚姻纠葛案件中，被从当时的昭通行署秘书长的任上撤下来，事后虽弥补在地区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任上，象征性地补回了被落实政策的回味，但逝去的年华与遗憾，却似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留下了不尽慨叹！

王正昌

2008年4月13日

目 录

古城昭通的狂风暴雨	1
“四人帮” 倒台	31
受命危难	43
彝良县开展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”概况	52
拨乱反正	108
落实政策	166
改革开放	
——农村包产到户	192
后记	214

古城昭通的狂风暴雨

一九六六年的春天，是个早春年份，春节刚过，已是桃红柳绿，春意盎然，百花齐放，具有昭通特色的苹果花、樱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，烂漫争艳，把昭通这块古乌蒙大地，装点得锦绣似玉，如痴如醉，逗蜂蝶起舞，惹游人云聚。微风吹拂，花香扑鼻，布谷声声，好鸟吱啾，万物复苏，一片生机蓬勃景象。时过景迁，初夏刚至，暴风骤雨，雷鸣电闪，谁能经得起这种摧残？

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，向全国发出《通知》：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开展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”。紧接着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住地中南海，写出《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对国家主席刘少奇、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邓小平，采取突然袭击，《大字报》提出：“从中央（指刘、邓）到地方（指各省、市、地、县、区、公社、大队、小队）各级，都执行着一条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。”正是这张《大字报》的“星星之火”燎原起全国范围“文化大革命运动”。首先是首都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写出《大字报》，刷出《大标语》表示热烈拥护，积极响应伟大领袖、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、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”，并别出心裁地提出：他（她）们是保卫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”的“红色卫

兵”。清华、北大学子的创举，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。中央“文化大革命运动”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（毛主席的夫人）窜到清华、北大，号召两校学生，停课“闹革命”，走出校园，南下北上，串连全国大、中学校学生，组建“红卫兵”组织，保卫毛主席、保卫毛主席的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”，向各级、各部门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猛烈开火，用“四大”（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批判）方式，把他（她）们批深、批透、批倒、批臭，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让他（她）们永世不得翻身。

清华、北大的“红卫兵”到达昭通，形若“钦差大臣”，很快就把昭通一中、二中、三中、师范、卫校、财校、技校、农校和各县的初、高中学生串连、组建起名目繁多、各式各样的“红卫兵”战斗团、队、小分队、司令部，他（她）们身着军装，臂戴“红卫兵”袖章，胸别毛主席像章，手持《红宝书》（毛主席语录），唱着《东方红》赞歌，喊着：誓死保卫毛主席！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！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！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不达目的决不收兵！……等等口号，他（她）们，天真无邪，无私无畏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号称是毛主席指挥的天兵天将，雄纠纠、气昂昂穿梭在古城大街小巷，冲击“四旧”（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、旧思想），捣毁城乡文物古迹，封闭歌颂“帝、王、将、相，才子、佳人”的昭通地区京剧团、花灯剧团、电影院，抄没焚烧文人墨客收藏古书、字、画、古玩，捣毁所有的寺庙、道观，勒

令和尚、尼姑、道士扫除“封建迷信”，参加体力劳动，吃浑吃肉。查封基督教堂、天主教堂、清真寺、宗族祠堂，要伊斯兰回族吃猪肉，取消阿訇，不准苗族耍“花山”，不准彝族过“火把节”，不准汉族过“端午节”、“中秋节”，“清明扫墓”，认为以上这些都是“封(封建主义)、资(资本主义)、修(修正主义)”毒害“无产阶级”的东西。横冲直闯，喊着毛主席教导的：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口号，冲击党政机关和各部门办公住地。“天兵天将”们向各级各部门领导及其整个领导班子刮起了“十二级台风”。打倒昭通地委！火烧昭通地委！油炸昭通地委！打倒以康守忠（地委书记）为首的康修集团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“当权派”康守忠、刘少军（地委副书记）！常廷范（地委副书记）、唐吉盛（专员）、赵葆印（副专员）……！随时任意勒令地委书记们、专员们到“红卫兵”召开的大、小会上接受批斗，答复问题，很多时候是“红卫兵”轮班批斗，轮流批斗，整天批斗，通宵批斗，批斗的内容偏重学校教育方面，全盘否定教育制度、教育方式和一些具体琐事，不时还勒令党、政部门领导和办公室主任、秘书等陪斗，“红卫兵”的批斗方法，一般都是文斗，最常见的是“低头认罪”，没有打、骂和动刑。同时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、大标语、漫画贴满了古城的主要街道，大喇叭有线、无线广播 24 小时吼闹，震耳欲聋，吵得鸡犬不宁。“红卫兵”小将们，三五成群，想批斗谁就批斗谁，毫无阻拦地随便进出党政机关。

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闫红彦，因经不起“红卫兵”的纠缠和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述、副组长江青，在电话上发生争吵，一气之下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。“红卫兵”造反组织，也扩大变化，一些工矿企业、学校教职工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城市居民、青年农民都纷纷成立起各种各样的“无产阶级造反‘司令部’或‘战斗团、队’”，手臂戴上“红卫兵”袖套，扛着团、队大旗，喊着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口号，揪斗各级大、小领导。在各种各样人数不等的批斗会场上，开初是“答复问题，低头认罪”文斗，随着运动深入发展，一些平素对领导抱有成见和不满的同志，乃至战争年代的战友，和个别少数对共产党、对领导干部怀有仇恨的人，趁机挤入“造反派”队伍，对“走资派”进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，举国上下，揪斗走资派从低头弯腰，逐步升级罚跪、捆、绑、吊、打、胸挂“走资派”、“三反分子”（反党、反毛泽东思想、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）大黑牌，头戴一米多高尖尖帽，两手反绑，丑画脸谱，由“红卫兵”押解游街、游厂、游校、游村示众，有的被二十四小时不给饭吃、不给睡觉轮番批斗，使用的各种刑具刑罚，远比《红岩》美蒋特务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残酷得多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、各系统的所有领导（整个班子）都被打倒批臭，全部遭受批斗，多数被轻重不等的打伤致残，少数被关进私设的监牢即所谓“牛棚”，由“红卫兵”看管，不断地遭受肉体上的毒打，精神、人格上的侮辱，饮食克扣，有的被

活活打死、饿死、折磨死。

随着各级各部门的领导——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”被打倒，他(她)们所领导的机关部门——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挥部”被打、砸、抢分子捣毁。牌子被砸烂，印章被抢走，一切办公用具和设施以及办公室、会议厅堂被造反组织捣得椅歪桌翻，文件柜内机、绝密文件撕得遍地皆是，电灯、电话被切断，门窗被砸破、打碎，断墙残壁。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转，全面处于无政府状态。毛泽东发布最高最新指示：“这种混乱好得很，乱是乱了敌人、锻炼了自己（红卫兵）。”从此，全省各级领导机关瘫痪了，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转。可笑的是这些红卫兵组织，在夺了权后拿着机关大印，不知道权如何掌，印如何盖，短时间的“群龙无首”，“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”，一片混乱。昭通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奉命进行“三支”（支持“左派”，支持工人，支持农民），“两军”（军事管制、军事训练）。分别接管了地、县各级党政机关和公、检、法、银行、财政等要害部门，并沿用了这些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组建了“八一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组织”，公开宣布为“左派革命”组织，表示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。引起了绝大部分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和没有“受封派别”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及厂矿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极大不满，认为天下是红卫兵打下的，军分区及其支持的八一派组织，是从“峨眉山下来摘桃子”的组织，于是中学生和广大机关干部，大部分厂、矿工人，实行大联合，成立“昭通红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

部”。革命造反组织，人为的分裂了。大会小会、街头巷尾、乃至家庭都辩论，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，从辩论到争论、从争论到咒骂，从咒骂到徒手吵架，从徒手打架到棍棒打斗、从棍棒打斗到刀枪相见，一步一步升级，互有伤亡，死了人，彼此打红了眼，昭通军分区少数人打开军火仓库，发给八一派武器弹药，利用农村民兵组织，采用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方法，包围了昭通城的红旗派“黑匪”。城内“红旗派”，也从公安机关仓库拿出了一些旧枪械，商业部门拿出一些猎枪、鸟枪，物资部门拿了一些炸药、钢管成立军工厂，制造土炮、土手榴弹，总指挥部设在辕门口老党校，四门分设四个战区，防御抵制“八一派”的围攻。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一九七六年底，七年时间两派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，几乎每天都有大小不同的枪声战斗，每天都有人员伤亡，两派成员结下了很深仇恨，直到一九七二年秋，昆明军区派来国防军七六四五部队两个营，驻扎两派之间交界处制止武斗，促成双方派出代表，到北京谈判，达成了停火交枪停止武斗的协议，赴京代表回到昭通后，在七六四五部队的监督下，两派举行交枪仪式，“八一派”的武器交还军分区，“红旗派”的武器交七六四五部队。战争的硝烟暂时散了，但是两派裂痕和仇恨丝毫没消除。在双方推荐革命领导干部进入地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讨论中，明争暗斗明显表露出来，红旗派推荐红旗观点原地委书记康守忠，八一派推荐八一观点原地委副书记常廷范，双方各自美化自己推荐的

是好干部，丑化和捏造罗织莫稀有的罪名攻击对方推荐的干部，争执不下，最后报省革委裁定，由康守忠担任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，实行“两派”大联合，团结起来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。学校复课闹革命，围城农民回乡生产闹革命，社会有了一定安隐，“两派”斗争有了一些缓和。可是好景不长，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。从北京下来，就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、云南省委书记的谭甫仁，带着框框，下车伊始，他首先认为大、中学生“红卫兵”已完成打倒“走资派”的历史使命。按照毛主席的“最新最高”指示：“农村是广阔的天地，全国所有的大专学生、高中学生、初中学生，都要上山下乡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”这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立下“丰功伟绩”的“老革命”、“红卫兵”小将们，只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，履行天安门向毛主席的誓言：“毛主席指向哪里，就奔向哪里”，“刀山敢上、火海敢闯，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。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和行李包袱，辞别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弟弟、妹妹，离城离家，去过“蹉跎岁月”的“知青”生活。随着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深入发展，在这些上山下乡的“知青”中，又划分出“红五类”（工人、贫农、下中农、军人、革命干部的女儿）；“黑五类”（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、右派分子的女儿），红五类可以在招生（进工农兵大学）、招干部、招兵、招工人得到优先照顾，“黑五类”只能在农村安家落户，长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（监督劳动）。这样曾经在中国大地上“叱咤风云”的“红卫兵”小

将队伍，被化整为零，只是在《中华词典》上增加了“红卫兵”和“知青”两个新名词。谭甫仁又在全省范围吹起以昆明“八·二三派”（地、州、县相同观点的派）为左派——正确为准，“进行划线站队”，凡是与“八·二三派”观点相同的都是站队站对了的正确派——“左派”即无产阶级革命派。相反观点的“炮兵团派”（地、州、市、县相反观点的“派”），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保皇派，都是站队站错了的右派，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派。这样，在各级军管会（军分区县、区武装部）直接领导、指挥下，一场规模更大、范围更广，手段最毒，斗争最残酷，支持指挥一派镇压、迫害、屠杀另一派的“划线站队运动”轰轰烈烈地从机关部门到厂矿、企业、学校，从城市到农村（农民）迅猛异常地开展“划线站队”。

“文革”初期都是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”。在斗争“走资派”中产生了一些分歧，特别是军队介入“支左”后，逐步形成观点不同的两派，从分歧发展到对立，“划线站队”从此又把两派鸿沟拉开、加宽、加深、加大，“正确派”可以名正言顺、明目张胆地把多年来积下的怨恨通通进行清算、报复发泄。军分区、武装部原来就实行武装一派，消灭一派，没有消灭，这下子机会来了，可以利用“划线站队”指挥地方，组织一派镇压、残害、消灭一派。首先在各机关、单位、工矿企事业、学校成立以“八一派”头目为领导的“划线站队”清查小组（军管单位或派有军代表的单位，由军人担任主要领导），

又专门成立了“五七干校”，把地、县级党、政机关和公安、检(察)、法(院)的全体干部、职工、干警，集中进校学习“划线站队”。接着对红旗派的主要头头，和与红旗派观点相同的各级干部和领导干部（两派武斗前夕就被打倒、批倒、批深、批臭的“死老虎”、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），进行大逮捕，有的被带上脚镣、手铐关进大牢；有的被捆绑、挂上黑牌(牌上写：反军乱军分子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，反革命分子黑(红)旗派反动头目……等等，并在分子姓名上用红笔划上××)，戴尖尖帽子，穿麻布褂、臂戴黑纱（表示为正确派在武斗中身亡的烈士披麻戴孝），油墨抹脸、涂头（表示黑(红)旗派的坏黑头，在正确派战士(手持棍棒，臂戴红袖章)的押戒下游街、爬街、三步一跪跪街示众。从城镇到农村被捆绑丑化的各种“分子”穿梭游动，川流不息，特别是在全区 450 万人口的这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城市——昭通城，对各种“分子”的丑化游行示众，更是心裁奇特，丑化繁多，光怪陆离，有的被身着奇装，石灰涂脸，颈上套枷，双手锁镣铐，坐在四人抬的无顶轿中游街；有的被满头满脸油漆涂黑，双手被两人从背后反架向上(谓之喷气式)；有的被画成红眉毛、绿眼睛、蓝脸面（谓之黑旗派的妖怪），多数是女职工、女同学、女市民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爱人或女儿；有的被身穿白麻布衣，腰系草绳，脚踏草鞋，头戴孝帽跪爬行走(谓之为“八一派”死难烈士尽孝)；有的被头顶两公尺以上尖尖帽，胸挂几十公斤重钢板

或厚木枋板，上写“反军乱军分子”、“反革命分子”，还在走的走资派……分子，手提小锣，边走边敲边喊：我是“……分子”（谓之此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者）；有的被五花大绑，脸涂炭灰，背揸二三公尺长的钢管（谓之炮派黑干将、黑打手、黑后台）；有的被脸涂石灰，两眼画成画眉眼，嘴画血盆大口，身穿七品官服，（头戴官帽从戏院拿来的服装，谓之资本主义的县太爷，多是文革前的县委书记、县长）；有的被石灰涂脸，眯眉鼓眼，头戴和尚帽，手拿鹅毛扇（谓之黑旗派的“歪嘴和尚”、“黑军师”、“黑参谋”）。如此奇形怪状的游行示众队伍，你来我往，川流不息，整个昭通城的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，押解队伍边走边振臂高呼！打倒……分子！文化大革命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万万岁!!!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！永远健康!!! 倾城的口号声、“鸣锣开道”的锣鼓声、刽子手们毒打“分子”的吼叫声，被毒打者的惨叫声，汇成一幕幕大悲剧，恐怖、惊慌、可怕，阴风惨惨，笼罩着昭通城。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循环往复，折磨折腾了一个多月，示范和推动了全区、各县、区如法炮制。游街示众初期，广大群众还挤站相看，几天以后，司空见惯，无人理睬，无众可示。押解人员走累了、打累了，“划线站队”司令部，“因势利导”发出了停止游行示众，转入分组学习。

地区和各县成立的“五七干校”，把党委、政府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的全体干部、职工、干警，机关、厂矿、学校、企、事业单位集中“五七干校”，按 30 人左右编为